

青少年行为自主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刘艳¹, 蒋索^{2,1}

(1.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 北京 100875; 2. 温州医科大学应用心理学系, 温州 325035)

[摘要] 行为自主指个体在生活中可以不依赖他人, 独立作出各种决策并加以执行的能力, 是个人自主的重要体现。青少年行为自主的研究源于精神分析理论, 当代学者沿袭对青少年自主内涵的界定, 并结合社会认知理论发展出基于家庭决策方式的测评工具。行为自主的发展轨迹、影响因素以及与心理社会功能的关系是目前研究的三个焦点。具体而言, 青少年行为自主水平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但各领域并不完全同步; 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出生顺序、文化背景是相关的影响因素; 行为自主与心理社会功能的具体关系尚不明晰, 可能受自主获得时间、决策方式的动机类型、事务领域、文化环境的调节。未来应开发更有效的行为自主测量方法, 揭示其发展机制, 拓展考察其他相关因素, 并深入反思行为自主与心理社会功能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行为自主; 青少年; 心理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 B8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8)04-0039-11

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看, 无论是学步婴儿在周围环境中的自由探索, 还是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向父母提出自由支配零花钱的申请, 还是长期在经济上依赖配偶的中年人在离异后重返职场, 其背后都有个体寻求独立与自主的动机。与对自我同一性的追寻一样, 成为自主的“自治者”(self-governing person)也是贯穿生命全程的发展任务(Smetana, Campione-Barr, & Daddis, 2004)。儿童对抚养人的依赖是其安全与生存的基本保障, 而成年者的自立自主既是社会对其社会主力群体的要求, 也是成年人自身实现良好发展、收获个人幸福的必要前提。青少年处于由天真懵懂的儿童成长为独立担当的成年人的过渡阶段, 这一时期的自主发展获得了发展心理学研究尤为突出的关注。

从理论上说, 青少年自主包含情绪自主、行为自主和认知自主三个方面(Steinberg, 2002)。其中, 行为自主(behavioral autonomy), 即个体在生活中独立进行决策并执行这些决策的能力, 是得到了最为充分关注的一种自主类型。从20世纪90

年代至今, 围绕青少年行为自主的实证研究从未间断, 相关争议也持续至今。争议持续所带来的最突出问题, 是对于日常生活中常见却也是重要的议题(如, 父母是否应当鼓励孩子的行为自主? 什么时间点的行为自主是适宜的? 又或者, 哪些方面的自主权应交由孩子, 哪些方面父母在孩子的青少年阶段仍应保持相当程度的卷入?), 研究者们并不能给出基于实证研究的科学建议。本文的主旨, 即回顾青少年自主研究的源起, 梳理当前该领域的主要发现, 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的方向作出展望, 以期推进该领域内现有争议的解决。

一、青少年行为自主研究的源起

青少年行为自主研究的源起可追溯至精神分析理论(McElhane, Allen, Stephenson, & Hare, 2009)。依照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 大约在出生后4到5个星期的时候, 人类婴儿有了意识, 能够感知到母亲的存在。但直到5个月左右, 婴儿都是将自己和母亲视为一体的, 且认为在自己和母亲周围

[收稿日期] 2017-09-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主科研项目“青少年自主水平的影响因素与促进研究”(16JJD880007)。

[通讯作者] 刘艳, E-mail: yan.liu@bnu.edu.cn

存有一道屏障,隔离着外部世界。随着社会化过程的展开,婴儿慢慢将自己从与母亲的共生体中“孵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幼儿,完成生命过程中的第一次个体化(individuation)。进入青少年期,个体化再度成为人类个体需要积极面对的发展任务。但与第一次个体化的内涵不同,生命中的第二次个体化要求青少年松开与父母之间的过于紧密的联结,褪去对家庭的依赖,成为自主的成年人(Blos, 1967)。因此,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青少年的自主即意味着个体在情感和物理空间上将自己和父母分离开来,逐步从父母手中接过对自身行为的决策与调控权,承担起对于自我的责任。

后续研究者继承了精神分析理论将独立赋予个人自主核心要义的观点,并进一步将个人自主区分为三个不同侧面:(1)认知自主(cognitive autonomy),指青少年能够形成与表达出属于自己的思想、观点或价值观。(2)情绪自主(emotional autonomy),指青少年对父母在情感支持或情绪调节上的依赖减少。这一形式的自主又包含两个不同维度:分离(separation)与疏离(detachment)。分离意味着青少年能够从情感上将自己与父母分离开来,代表着情绪自主的健康方向;疏离则意味着青少年对于父母的疏远与不信任,是情绪自主的不健康表达。(3)行为自主(behavioral autonomy),指青少年可以不依赖于他人、独立作出决策并执行这些决策。

对于认知自主、情绪自主与青少年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所得到的发现是较为一致的。即,认知自主以及情绪自主中的分离维度都与个体的积极发展相联系,而情绪自主中的疏离维度则与个体的消极发展相联系(Beckert, 2007; Majorano, Musetti, Brondino, & Corsano, 2015)。但是,关于行为自主,不同研究的结论却存在较大争议。不一致的发现引发了更多研究者展开以行为自主为主题的研究,因此实际上,行为自主既是争议最多,也是相关研究的数量最为突出的一种自主类型。

二、青少年行为自主的测量方法

基于行为自主的内涵,实证研究通常以青少年在家庭中参与各种事务决策的程度作为评估青少年行为自主水平的指标。如果家庭中各类事务皆由父母为青少年决策,青少年行为自主水平最低;

如果遇事由父母和青少年共同决策,行为自主居中;青少年的独立决策则代表着最高水平的行为自主。近年来,受到社会认知领域理论(social-cognitive domain theory)的影响,一些研究者会依照家庭事务所属的类别,区别探讨青少年在不同领域中表现出的行为自主水平。

社会认知领域理论认为,社会化过程中,个体参与的社会互动类型多样,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促成个体能够对社会生活事件依照其性质与意义进行区分。总体上,该理论将个体对社会生活事件的分类划分为4个领域:(1)道德领域(moral domain),归入该领域的事件与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以及人际间的伤害相联系,如盗窃、诋毁他人名誉等;(2)习俗领域(conventional domain),指与维系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规则相关联的事件,如就餐礼仪、晚辈与长辈说话的方式等;(3)个人领域(personal domain),指无关乎他人,仅关乎个人选择或权益的事件,如个人的穿着风格、阅读喜好等;(4)谨慎领域(prudential domain),指对个人的健康与安全存在威胁的事件,如吸烟、药品滥用等(Nucci, Guerra, & Lee, 1991)。

由社会认知领域理论的上述基本观点,研究者在测查青少年行为自主的水平时,会让青少年或父母分别对家庭中属于不同领域的事务的决策方式进行评估。不过,有研究表明,对于某一事务应划归哪一领域,青少年和父母可能持有不同观点,争议通常发生在个人领域与习俗领域、谨慎领域之间(Wray-Lake et al., 2010)。例如,对于何时就寝、是否应当保持自己房间的整洁,青少年都倾向于归入个人领域,但父母一般会将它们分别视为谨慎领域和习俗领域的问题。由此,不少研究会为这些性质归属存有争议的事务设置一个单独的维度,即“多领域”(multifaceted domain)维度(如Daddis, 2011; Wray-Lake et al., 2010)。此外,也有实证研究在道德、习俗、个人、谨慎和多领域维度之外,还设置了朋友领域(friendship domain)与学业领域(academic domain),分别指向青少年在与同伴交往相关的事件(如是否能在朋友家留宿、可以开始约会的年龄等)和与学业发展相关的事件中所实现的自主水平(如Chen, Vansteenkiste, Beyers, Soenens, & Van Petegem, 2013)。

从具体测量工具看,该领域内的研究工具相对

集中,多数研究都是将 Dornbusch 等人(1985)或 Steinberg(1987)各自编制的家庭决策量表根据自身研究需要进行些微修订。这两份决策量表的基本形式非常相似,都是就家庭中的各类事务询问孩子或家长,这些事务在日常生活中是由谁来决策的。不同研究中,研究者为孩子或家长所提供的备选项不完全一致,但大体都会设置“完全由父母决策”、“父母与我商议后作出决策”、“父母与我共同决策”、“我与父母商议后作出决策”以及“完全由我决策”几个选项。对被试回答进行分析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将备选项视为代表着从青少年低水平的行为自主至高水平的行为自主的连续体。第二种分析方式是将“完全由父母决策”、“父母和我商议后作出决策”这两个选项的得分相加除以问卷项目总数,得到父母决策分数(unilateral parental decision making);将“父母与我共同决策”选项得分除以问卷项目总数,得到共同决策(joint decision making)分数,将“我与父母商议后作出决策”与“完全由我决策”选项得分相加除以问卷项目总数,得到青少年决策(unilateral adolescent decision making)分数。在标准化的测量工具之外,也有研究仅以单个题项实现对青少年自主水平的考察,即直接以一个项目询问青少年家庭中事务决策的方式(如 Gutman & Eccles, 2007; Haase, Tomasik, & Silbereisen, 2008; Pavlova, Haase, & Silbereisen, 2011)。尽管采用这一测量方式的研究并不在少数,但从心理测量学角度看,该种评估方法的信度与效度值得商榷。

三、青少年行为自主的发展轨迹

由生活经验即可知,随年龄增长,青少年的行为自主水平会逐步提升。实证研究支持了基于生活经验的推测(Dornbusch et al., 1985; Dornbusch, Ritter, Mont-Reynaud, & Chen, 1990; Dowdy & Kliwer, 1998; Gutman & Eccles, 2007; Smetana et al., 2004; Wray-Lake et al., 2010)。不过更重要的是,实证研究揭示出了关于青少年行为自主发展轨迹的更为细致的图景。首先,由童年中期至青少年晚期,行为自主的发展并不完全呈直线式上升。Dornbusch(1985)的横断研究结果显示,由青少年早期至晚期,青少年决策水平提升、父母决策水平下降,而共同决策的发展则呈现出先升

后降的趋势,最高点在青少年中期。均采用纵向研究设计,Gutman 和 Eccles(2007)的研究与 Wray-Lake 等人(2010)的研究得到了非常一致的发现,由童年中期至青少年中期,独立决策水平稳步上升;约 15 岁之后,提升速度显著加快。这一发展趋势符合阶段—环境匹配(stage-environment fit theory; Eccles et al., 1993)理论的基本观点。在青少年中期之前,可能父母和青少年的共同决策是最为理想的一种事务决策方式;但在进入青少年晚期之后,由于个人能力与主要需求的发展,共同决策需让位于独立决策。同时,Wray-Lake 等人的这一研究也揭示了行为自主这一整体发展规律之中的两点特例,即在健康和零花钱(在该项研究中分别归属谨慎领域和多领域)这两项事件上,行为自主的发展一直呈线性上升轨迹,且青少年中期之后,逐步落后于其他事项上的自主水平。这说明在健康和零花钱问题上,在童年中期之后,父母会逐步让孩子拥有更多的决策权,但在孩子成年之前,父母都不会完全放手交由孩子独立决策。

第二,在不同领域,行为自主的发展轨迹不完全同步。总体而言,青少年自主水平由高到低的领域依次是个人领域、多领域、谨慎领域和习俗领域(Hasebe, Nucci, & Nucci, 2004; Smetana et al., 2004; Wray-Lake et al., 2010)。不过,Hasebe 等人(2004)和 Smetana 等人(2004)的研究都报告:在青少年晚期,个体在谨慎领域和习俗领域的自主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而 Wray-Lake 等人(2010)的研究发现:几乎贯穿整个青少年期,青少年在谨慎领域的自主水平都高于习俗领域。尽管确定性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检验,但考虑到 Wray-Lake 等人(2010)研究中,在青少年晚期,谨慎领域和习俗领域的分数差异也有逐步减小的趋势,可以推测习俗领域可能是父母放手最晚的一个领域,但随着青少年逐步向成人期过渡,父母在该领域给予青少年的自主权会逐步接近谨慎领域。

第三,对于家庭中青少年行为自主所处水平,父母和青少年的视角存在差异。大多数关于青少年行为自主的研究,都只是请青少年报告家庭中各类事务的决策方式,但 Smetana 等人(2004)的研究同时让母亲和青少年完成了家庭决策量表。有意思的是,分析结果表明,三次追踪之中,有两次母亲和青少年的评估结果不相关,仅有一次表现出中

等程度的相关($r = 0.29$);大多数数据点上,青少年的评估分数都高于母亲。Smetana 等人认为,有可能青少年对自主的期望导致他们对自己的自主水平有所高估,而母亲对教育的投入又导致她们对青少年在家庭决策中的作用有所低估。

四、青少年行为自主的影响因素

(一)性别

尽管不少研究都涉及行为自主的性别间比较,但在该问题上并未形成明确定论。Dornbush 等(1990)、Dowdy 和 Kliever(1998)、以及 Pavlova 等(2011)的研究报告了男孩行为自主水平高于女孩;Flanagan(1990),Bumpus、Crouter 和 McHale(2011),以及 Wray-Lake 等人(2010)的研究报告了女孩自主水平高于男孩;Smetana 等人(2004)、Fuligni 和 Eccles(1993),以及 Peterson、Bush 和 Supple(1999)则未发现男孩和女孩行为自主水平的显著差异;Gutman 和 Eccles(2007)的研究还显示了性别与行为自主之间关系的另一种可能,即虽然男孩和女孩行为自主的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但发展轨迹不完全相同,青少年中期之后,女孩行为自主的发展速度快于男孩,且不同于男孩的行为自主在 17 岁之后趋于稳定,女孩的行为自主自 13 至 19 岁间一直处于提升状态。对于不同研究所揭示的行为自主性别差异的不一致性,研究者们推测可能是因为家庭性别角色观念是青少年行为自主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研究的不一致只是反映了被试群体家庭性别角色观念的差异(Wray-Lake et al., 2010)。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行为自主的关系,现有研究的结论也不一致。Flanagan(1990)报告了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青少年拥有更高自主决策水平的发现。从理论上,这一发现可用 Lareau(2002)所提出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教育理念的关系模式进行解释。基于访谈和观察数据,Lareau 提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父母,大多持有“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的理念。他们会为孩子提供必要的条件,但很少参与和卷入孩子的各类活动。与此相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父母,多持有“协作养育”(concerted cultivation)的理念,他们会为孩

子创设结构化的日常生活,高度卷入孩子的各类活动,因而给予孩子独立决策的机会相对较少。然而,更多的研究得到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青少年行为自主水平更高的结论(Nucci et al., 1991; Pavlova et al.; 2011; Wray-Lake et al.; 2010)。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父母通常更为强调父母的权威,更多地表现出控制性的教养方式。

(三)出生顺序

家庭系统观(family systems perspective)(Cox & Paley, 1997)和同胞分化理论(sibling differentiation theory)(Feinberg, McHale, Crouter, & Cumsille, 2003)是研究者们对家庭中出生顺序不同的孩子行为自主水平展开比较分析的理论基础。基于家庭系统观的实证表明(Whiteman, McHale, & Crouter, 2003),父母往往会经由抚养第一个孩子的经历,调整他们对于第二个孩子的养育过程。通常,在孩子年龄相当的时候,父母与第二个孩子的冲突更少,温暖表达更多,且此时父母对于亲子关系是一种双向而非单向关系也有更为清晰的认识。由此,研究者推测,相比较第一个孩子,父母对第二个孩子会适当减少控制,给予更多自由。同胞分化理论源自 Adler 的个体心理学,认为家庭之中,同胞之间为了减小竞争并各自获得父母最大程度的关注与投入,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加大彼此各方面的差异,在不同道路上寻求自我认同的实现。由此,研究者们也作出了家庭中第二个孩子会比第一个孩子拥有更高决策独立性的推测,因为他们期望自己能够尽快确立为自己所特有的行事风格及与周围环境互动的方式,从而更大程度地与年长同胞分离开来。

与此理论推测一致,Bumpus 等(2001)和 Wray-Lake 等(2010)的研究都得到了家庭中第二个孩子的行为自主水平高于第一个孩子的发现。尤其是在童年中期和青少年早期,这一出生顺序效应更为凸显。不过,近期 Campioner-Barr、Lindell、Short、Greer 和 Drotar(2015)的研究却显示,第一个与第二个孩子行为自主的相对优势取决于决策领域、青少年的年龄以及行为自主评估者是青少年本人还是其母亲等一系列因素。具体而言,由青少年自我报告,出生顺序效应在任一领域都不存在。

由母亲报告,在青少年早期,第二个孩子在习俗领域有更高决策自由;但与理论推测相反,在青少年晚期,第一个孩子在谨慎领域有更高的决策自主。Campioner-Barr 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往往较第一个孩子更为叛逆,更有可能尝试存在潜在危险的活动,因而父母会对其在谨慎领域有更多的控制。

(四)文化

个人独立性在个体与集体主义文化中被赋予的不同价值已为众多研究所探讨。个体主义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于将社会成员视为相互独立的个体,生活于其中的青少年会逐步认识到,个人的选择与决策是个人自主实现的必由途径。然而与此相对,集体主义文化注重人际关系的意义,社会化过程鼓励青少年面临决策时,征询与采纳他人意见,甚至在必要时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Chao 和 Tseng (2002)对 20 世纪后 20 年间的几十项关于亚洲国家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表明,相比较西方,亚洲家庭更为强调父母权威,孩子对父母的依赖程度更高。

Qin、Pomerantz 和 Wang(2009)的研究则直接考察了在作为个体主义文化代表的美国,与在作为集体主义文化代表的中国,青少年行为自主水平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发现,七年级时,较之中国青少年,美国青少年行为自主水平更高;随后一年之中,两国青少年的行为自主都会提升,但美国青少年的发展速度更快。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由七年级至八年级,美国青少年行为自主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独立决策水平有显著提升,但中国青少年决策方式的改变主要是由父母决策逐步向共同决策转换。

五、青少年的行为自主与心理社会功能

(一)关于两者间关系的基本发现

尽管从理论上,自主的获得历来被视为青少年阶段的重要任务,但关于行为自主和青少年心理社会功能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却非常不一致。支持行为自主积极发展意义和揭示其消极发展意义的研究都不在少数。

Dornbush 等人(1985,1990)的早期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独立决策水平与其偏差行为(如吸烟、逃学、离家出走等)存在显著正向联系,与其自尊、学业能力等积极适应指标存在显著负向联系。近年

来, Van Petegem 等人的系列研究(Van Petegem, Beyers, Vansteenkiste, & Soenens, 2012; Van Petegem, Vansteenkiste, & Beyers, 2013)也支持了青少年独立决策的消极意义。这几项研究发现,独立决策与青少年的各类问题行为都有着显著而稳定的正向联系,且独立决策水平较高的青少年与父母的情感联系也相对疏远。同时,这些研究还发现,青少年和父母的共同决策与青少年的积极发展与适应相关联。研究者们主要从两方面为独立决策的消极意义、共同决策的积极意义寻求原因。其一,较高的青少年独立决策意味着父母指导与监控的缺失或不力。青少年仍未发展成熟,过早地交付各种责任实际是将他们置身更高的发展风险之中。其二,父母与青少年的共同决策意味着父母和孩子之间需要就各种争议展开讨论,这一过程不仅有益于孩子言语和社会能力的发展,也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明晰自身责任。之后, Lamborn、Dornbusch 和 Steinberg(1996), Brown、Mounts、Lamborn 和 Steinberg(1993),以及 Fuligni 和 Eccles(1993)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父母和青少年的共同决策,而非青少年独立决策的积极意义。

然而,另一方面,不少研究得到了行为自主有助青少年积极心理社会功能实现的结果。首先是上述 Van Petegem 等人研究在得到独立决策与问题行为、亲子情感疏离存在正向联系的同时,也发现独立决策与青少年的自尊存在微弱但显著的正相关,与抑郁和焦虑存在微弱而显著的负相关。Smetana 等(2004)区别考察了青少年在个人领域、习俗领域、谨慎领域和多领域中的行为自主对一系列适应指标(学业成绩、偏差行为、自我价值和抑郁)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习俗和谨慎领域的行为自主对任一结果变量都没有显著预测作用;多领域和个人领域的行为自主对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学业成绩没有预测作用,但可显著正向预测其自我价值感、负向预测其抑郁水平。Hasebe 等(2004)的研究为包含美国和日本青少年的跨文化比较,关注父母在不同领域中的控制(也以家庭中事务决策的方式作为评估指标)与青少年内部情绪问题之间的关系,所得发现与 Smetana 等(2004)的研究具有较高一致性。该研究显示,父母在习俗和谨慎领域的控制与美国和日本青少年的内部情绪问题都没有显著联系,但父母在个人领域的控制与两国青少

年的内部情绪问题都存在显著正向联系,而父母在多领域的控制仅与日本青少年的内部情绪问题存在显著正向联系。Gutman 和 Eccles(2007)的研究以单个项目(“你和父母如何进行有关你的事情的决策?”)作为衡量青少年行为自主水平的指标,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行为自主的适应促进功能。这一研究显示,拥有更多决策机会的青少年自尊水平较高,但行为自主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在非裔美国青少年和欧裔美国青少年中表现出相反的关系模式。对于非裔美国青少年,较高水平的行为自主与较低的抑郁水平相联系,而对于欧裔美国青少年,较高水平的行为自主与较高水平的抑郁相联系。此外,该研究并未发现青少年行为自主与其偏差行为之间的显著联系。

(二)对于影响两者间关系可能因素的探讨

研究发现的不一致促使研究者不断思考与探寻影响行为自主与青少年心理社会功能关系的可能因素。

首先是行为自主的获得时间。理论分析为较早获得行为自主的负面效应提供了依据。阶段停止假设(stage termination hypothesis)(Brooks-Gunn, Peterson, & Dorothy, 1985)认为,如果在个体上一阶段的发展任务还未完成之时即迫使个体进入下一发展阶段,使其面对本应属于下一阶段的机遇与挑战,将会增大个体发展之中的风险,因为此时个体在认知与社会技能上并未做好相应准备。由此研究者 Dishion、Nelson 和 Bullock(2004)提出了过早行为自主(premature adolescent autonomy)的观念。Dishion 等人认为,日益增长的独立性是青少年期发展与适应的必要环节,理想的父母教养应是在给予青少年必要指导与监控的同时敏感回应其日益增长的自主需求。如果在该阶段,亲子关系疏离,父母对青少年生活事件的参与度过低,则青少年表现出的独立即是不成熟的,与成年期的自主只是具有表面的相似性。采用回溯性研究方法,Haase 等(2008)请年龄跨度分别为16-21岁和25-30岁的两组被试回忆自己第一次能够自主决定出门和回家时间的年龄(在被试所在的德国,法定时间为16岁),并以此作为划分个体行为自主获得时间早晚的依据。结果表明,相比较普通组,自主获得早期组(早于16岁)对未来的规划性较弱,偏差行为水平更高,同一性水平和人际关

系质量也更低。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过早行为自主”,目前研究者们并未结合对青少年发展特点的分析,阐明其具体内涵或界定标准。

阶段停止假设强调过早获得行为自主的消极意义。然而,由“成熟异常假设”,(maturational deviance hypothesis)(Brooks-Gunn et al., 1985),所有偏离某年龄段大多数个体发展轨迹的发展模式都将给个体带来压力。因此,不仅过早的行为自主会增加发展过程中的风险,相比较同龄人较晚的行为自主也会带来消极影响。Pavlova 等(2011)的研究试图对行为自主获得时间不同的个体的适应状况进行比较。该研究中,研究者请年龄跨度为19-37岁的被试回忆自己第一次能够自主决定离家和回家时间的年龄。依据被试回忆,研究者将被试的行为自主获得时间分为“早期组”(自主权获得时间在16岁之前,人数比例小于15%)、“适中组”(自主权的获得在16至18岁之间,人数比例大于70%)和“晚期组”(自主权获得时间在18岁之后或始终未能获得自主权,人数比例小于10%),并比较了不同组别的被试在学业成就、外部问题行为、积极与消极情绪、生活满意度以及人际关系等一系列适应与发展指标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早期组在各项指标上的表现都令人担忧:他们的学业成就在三组中最低,问题行为水平最高,消极情绪水平最高,积极情绪水平低于适中组,生活满意度最低,人际关系状况也最不理想。晚期组的适应情况在成年早期(在该研究中为19-28岁)表现出一定矛盾性,他们的问题行为水平最低,但积极情绪水平低于适中组,对同伴重要性评价较低(仅对于男性被试而言),拥有稳定伴侣的比例也较低。不过,在更年长的时候(在该研究中为28-37岁),晚期组的这些不利情况不再存在;相反,他们在各项指标上都有相对于其他组别更好的表现。总体而言,Pavlova 等(2011)的假设更多地支持了阶段停止假设而非成熟异常假设的推论,即过早获得行为自主是不利的,较晚获得行为自主可能会在一定时间段给个体带来不利影响,但长远而言,将会积极促进个体的发展与适应。

第二,近年来,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提出者与支持者对以独立、不依赖于他人为核心内容的自主界定提出了强烈质疑。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自主,或自我决定意味着个体认同

自身行为的价值,他们能够感受到是自己,而不是他人拥有对自身行为的调节权。依据这一定义,自主的对立面并不是依靠(dependence)而是他控(heteronomy),即个体认为自身行为由外部力量(external forces)或自身内部冲动(internal compulsion)所左右(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10)。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对于自主的这一理解,独立的个体并不一定是自主的。独立,有可能是由于个体生活中缺乏可寻求支持的对象,也有可能只是出于个体对外界的反抗。由这一观点出发,关于行为自主与心理社会功能之间关系的研究之所以表现出不稳定的结果,是因为这些以独立决策作为行为自主测查指标的研究并未能真正区分自主的独立决策与不自主的独立决策。Van petegen 等人(2012;2013)对行为自主研究中常用的家庭决策量表(Dornbusch et al., 1985)进行了改进,试图分离自主的独立决策与不自主的独立决策。改进后的家庭决策量表仍然请被试对生活中各类事件的决策方式进行判断。但之后,被试需挑选出得分最高(即独立决策水平最高)和得分最低的项目各3个,并依据自我调控问卷(self-regulation questionnaire)对自己在这六个项目上采取这样的决策方式背后的动机进行评判。由此,研究者不仅可以得到被试的独立决策分数,还可得到被试在生活中进行独立决策的自主性动机分数与非自主性动机分数,以及进行非独立决策的自主性动机分数与非自主性动机分数。采用该种测查方式的几项研究得到了非常一致的结论,虽在部分指标上,独立决策表现出了微弱的积极意义,但整体而言,独立决策的意义是消极的;特别是,青少年的独立决策水平与其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不存在显著关联,但无论是自主性的独立决策还是自主性的非独立决策,都能通过促进其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提升个人主观幸福感。可以说,此类研究对大量以独立决策为行为自主核心要义的研究提出了重要挑战,其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独立决策或非独立决策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体为何独立或非独立地作出决策。

第三,如上文所述,有关青少年行为自主的研究近年来逐步受到社会认知领域理论的影响。该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儿童青少年对属于个人领域事务的自由掌控是其感受到个人独立、体验到个

人自主感的决定性因素,对他们的健康发展与适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Smetana 等(2004)和 Hasabe 等(2004)的研究即支持了这一论述(具体见前文介绍)。基于此,一些致力于探讨青少年行为自主与其心理社会功能关系的研究在实现对青少年行为自主的考察时,会聚焦于青少年在个人领域和多领域的独立决策水平(多领域维度的事件青少年一般将其视为个人事务)。如 Qin 等(2009)以中国和美国青少年为被试的跨文化研究表明,行为自主对中国和美国青少年的情绪功能(emotional functioning;在该研究中由自尊、生活满意度、焦虑、积极与消极情绪等指标合成)都具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比较而言,美国青少年会从行为自主中获得更大的收益。Eagleton、Williams 和 Merten(2016)延续这一思路,以跨度14年的纵向研究设计考察青少年在个人领域和多领域的行为自主与其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部分地验证了研究者的预先假设,被试在青少年期这两个领域中的行为自主水平能显著负向预测其同时期的抑郁水平,但对后期抑郁的纵向预测作用并不显著。

最后,基于不同文化对个人独立性所赋予的不同意义,一些研究期待能够揭示出文化在青少年行为自主与其心理社会功能之间可能存在的调节作用。不过,虽然该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关于文化的调节作用的发现,但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并未能对文化的调节作用提供充分的实证证据。如在上文所述 Qin 等人(2009)和 Hasebe 等人(2004)的研究中,文化的调节作用相对微弱,且 Gutman 和 Eccles(2007)的研究所揭示的文化调节作用与 Qin(2009)的具有一定矛盾性。又如早期 Lamborn 等人(1996)的研究。该项研究比较了对于非裔、欧裔、亚裔和西班牙裔美国青少年而言,不同类型的决策方式(青少年独立决策、青少年与父母共同决策和父母决策)与各发展适应指标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的调节作用仅存在于父母决策和部分发展适应指标之间。总体而言,对于非裔美国青少年,父母决策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更好的心理发展与适应,但对于欧裔美国青少年,父母决策的预测作用是负向的;而对于亚裔和西班牙裔美国青少年,父母决策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

六、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成为自主的“自治者”是每一个体都无法回避的终身发展任务。探讨身心发展都处于关键期的青少年行为自主的基本规律,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由上文对过去几十年间围绕青少年行为自主所展开的研究可见,在这一领域之中,争议远多于确定性的结论。基于对当前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分析,本文提出未来研究的以下四个重要方向。

(一)发展更为有效的行为自主测量方法

当前研究对青少年行为自主的测量都是通过询问青少年在家庭中各类事务的决策方式进行的。研究者或是对青少年的选择进行分类,将其归纳为青少年决策、青少年与父母共同决策、父母决策三类,或是将备选项视为代表着从青少年低水平的行为自主至高水平的行为自主的连续体。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计分方式,都难以克服该种测量方法在基本测查思路上的核心不足,即,该种测查思路实际是将青少年的自主决策与父母对青少年生活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对立了起来。然而,无论是尚未步入成年期的青少年,还是人格渐趋成熟的成年人,自主都不应意味着对他人合理建议与适度帮助的排斥。特别是,如果在某些事件上,青少年和父母有着非常一致的认知,强求其在由研究者所提供的不同决策方式之间作出选择是没有切实意义的。对于隶属道德、习俗和谨慎领域的事件(如“是否信守对于他人的诺言”、“是否吸烟”等等),这种迫选所带来的问题可能尤为突出。

Van petegen 等(2012;2013)从自我决定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改进了传统的青少年行为自主测量方式,试图从个体采用各种决策方式背后的原因着手区分自主的决策与非自主的决策。依照该思路,自主的决策与非自主的决策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决策过程是否“独立”,而在于个体是否“认同”该种决策方式。Van petegen 等人发展的这一测量方式不再将自主与对他人意见的吸纳对立起来。然而,依照这一思路,只要个人是认同的,完全的他人决策也仍然是自主的体现。这一观点同样值得质疑。生活中,不能实现独立决策与行动的个体,即便是其认同对于他人的依赖,也很难称之为自主的自治者。

结合上述分析,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厘清行为自主的核心内涵,平衡独立决策与合理吸纳他人意见之间的关系,在体现个人独立性的同时包容必要的对个人社会支持系统的依赖。

(二)致力于对青少年行为自主发展轨迹原因的揭示

现有研究相对清晰地揭示了跨越整个青少年期,行为自主在各不同领域中的发展模式。概览已有研究的主要结论,不难发现,这些结论主要停留于对现象的“描述”。未来研究可从两方面深入该主题的探讨。第一,应对行为自主基本发展特征的揭示与对行为自主影响因素的探讨结合起来。一般规律与个体差异的关系是发展心理学中的基本问题之一。未来研究应改变当前孤立考察行为自主随年龄增长而发生的变化的现状,结合对行为自主影响因素的探讨,力求在实现对于行为自主个体差异理解的同时把握行为自主的一般发展轨迹。第二,当前围绕该问题开展的研究有较明显的数据驱动倾向,缺乏必要的理论引导与支撑。期待后续研究能够将青少年行为自主的发展置于该阶段整体发展的背景之中,从青少年期个体认知与社会性发展的基本规律着手探寻与理解青少年行为自主的发展轨迹。

(三)拓展对于青少年行为自主影响因素的探讨

目前,关于行为自主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人口学变量,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发现非常不一致。原因之一可能在于,这些研究在关注人口学变量作用的同时,缺乏对影响行为自主表现的近端变量的考察。例如,近年来,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视角的青少年自主研究非常注重家庭环境变量,尤其是父母教养方式对于青少年自主性动机或自我决定水平的影响。为数不少的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父母的自主支持是青少年自主的积极促进因素,而疏离的亲子关系、父母的心理控制则会显著降低青少年的自主水平(如 van der Kaap-Deeder, Vansteenkiste, Soenens, & Mabbe, 2017)。虽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自主研究在自主的内涵界定上与行为自主的相关研究存在根本性区别,两类研究少有交集,但从理论出发,前一类研究所揭示的自主影响因素也应对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具有一定影响作用。

在整个青少年自主研究领域,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家庭生活为背景展开。然而,青少年并不仅仅生活于家庭之中,同伴交往、学校环境也深刻影响着青少年期的成长与发展(Gutman & Eccles, 2007)。目前仅有研究从认知层面探讨了青少年觉知到的同伴自主水平与其自主需求之间的关系(Daddis, 2011)。在实际行为层面,行为自主如何受到家庭之外各环境因素的影响,现有研究还未能尝试作出回答。因此,积极拓展家庭外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应是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此外,在研究设计上,当前研究主要是简单考察影响因素与行为自主发展之间是否存在或正向或负向的联系,却未能涉及这些因素影响行为自主的深层机制。在拓展影响因素的基础之上,揭示不同影响因素与青少年行为自主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或调节变量是深入该领域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

(四)从不同角度深入关于行为自主与青少年心理社会功能关系的探讨

可以说,关于行为自主与青少年心理社会功能关系的探讨是该领域研究中最为核心的一部分,然而当前,它也是争议最为集中的一部分。现有研究的争议恰恰说明在该主题上展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充分必要性。

对于青少年期的行为自主,非常关键的两个问题是,什么时间获得行为自主是适宜的?何种水平的行为自主是适宜的?就前一问题,已有研究展开讨论。整体而言,得到了过早获得行为自主具有消极意义,而较晚获得行为自主更有利于青少年发展的结论。然而,已有研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行为自主获得时间“早”与“晚”的确定依据非常武断,既没有参照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征,也未能纳入对被试间个体差异的考量。关于个体发展的阶段—环境匹配理论(Eccles et al., 1993)指出:环境与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的匹配是决定其发展与适应状况的关键性因素。不同年龄段,个体对行为自主的需求必然不同,而相同的行为自主水平对不同阶段的发展个体而言,也必然体现出不同的意义。后续探讨行为自主发展功

能的研究,不应忽视个体所处的具体年龄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自主需求。同时,对于处于同一年龄发展阶段的个体而言,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行为自主的意义也可能不同。例如,能力是与个体独立性密切相关的心理变量。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对于能力水平较高的青少年,相对充分的行为自主权可能带来积极的发展意义,但对于能力水平较低的青少年,相同水平的行为自主权却可能适得其反。换言之,个体内部心理特征也可能是行为自主与心理社会功能之间的调节变量。后续研究可尝试从这一角度推进现有争端的解决。

关于何种水平的行为自主是适宜的,Gutman和Eccles(2007)曾指出:行为自主与青少年发展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曲线式的,过高或过低都是不适宜的。Gutman和Eccles以此来解释为何其研究揭示了在非裔美国青少年中,行为自主与较低水平的抑郁相联系,但在欧裔美国青少年中,行为自主却与较高水平的抑郁相联系。在欧裔美国青少年中,行为自主的整体平均水平已经相对较高,更高的行为自主则会带来不利影响。然而,迄今并未有研究直接对行为自主与青少年发展之间的曲线式关系假设进行。

关于行为自主与青少年心理社会功能的关系,未来研究亟待解决的另一问题是,目前尚未有研究区别探讨行为自主与不同心理社会功能指标之间的联系。在青少年发展与适应的不同侧面,影响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偏差行为、抑郁、焦虑、幸福感等等,它们与行为自主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不同?如前文所述,一些研究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类似的关系模式,另一些研究则揭示了行为自主与不同发展适应指标的不同联系。但关键在于,当前并未有研究从理论上深入分析行为自主对青少年发展与适应不同侧面可能存在的不同影响,从而导致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数据驱动的倾向。未来研究如能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区别探讨行为自主与不同心理社会功能指标之间的联系,不仅有助对行为自主发展功能的深入认识,更能为教育实践提供切实而具体的指导与建议。

[参考文献]

- Beckert, T. E. (2007). Cognitive autonomy and self-evaluation in adolescence: A conceptual investigation and instrument development.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9, 579-594.
- Blos, P. (1967). The second individuation process of adolescence.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22, 162-186.
- Brooks-Gunn, J., Peterson, A. C., & Dorothy, E. (1985). The study of maturational timing effects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4, 149-161.
- Brown, B. B., Mounts, N., Lamborn, S. D., & Steinberg, L. (1993).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peer group affiliation in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64, 467-482.
- Bumpus, M. F., Crouter, A. C., & McHale, S. M. (2001). Parental autonomy granting during adolescence: Explor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ntex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7, 163-173.
- Campione-Barr, N., Lindell, A. K., Short, S. D., Greer, K. B., & Drotar, S. D. (2015). First- and Second-born adolescents'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throughout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45, 250-262.
- Chao, R., & Tseng, V. (2002). Parenting of Asians. In M. H. Bornstein (Ed.), *Handbook of Parenting: Vol. 4: Social Conditions and Applied Parenting* (2nd ed., pp. 59-93).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Chen, B., Vansteenkiste, M., Beyers, W., Soenens, B., & Van Petegem, S. (2013). Autonomy in family decision making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Disentangling the dual meaning of autonom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 1184-1209.
- Cox, M. J., & Paley, B. (1997). Families as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8, 243-267.
- Daddis, C. (2011). Desire for increased autonomy and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peer autonomy: "Everyone else can; Why can't I?". *Child Development*, 82, 1310-1326.
- Dishion, T. J., Nelson, S. E., & Bullock, B. M. (2004). Premature adolescent autonomy: Parent disengagement and deviant peer process in the amplification of problem behavior.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7, 515-530.
- Dornbusch, S. M., Carlsmith, J. M., Bushwall, S. J., Ritter, P. L., Leiderman, H., Hastorf, A. H., et al. (1985). Single parents, extended households, and the control of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56, 326-341.
- Dornbusch, S. M., Ritter, P. L., Mont-Reynaud, R., & Chen, Z. (1990). Family decision making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a diverse high school popula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ce*, 5, 143-160.
- Dowdy, B. B., & Klierer, W. (1998). Dating,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nd behavioral autonom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7, 473-492.
- Eagleton, S. G., Williams, A. L., & Merten, M. J. (2016). Perceived behavioral autonomy and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from adolescence to adulthood.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5, 198-211.
- Eccles, J. S., Midgley, C., Wigfield, A., Buchanan, C. M., Reuman, D., Flanagan, C., et al. (1993). Development during adolescence-the impact of stage-environment fit on young adolescents experiences in schools and in famil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 90-101.
- Feinberg, M. E., McHale, S. M., Crouter, A. C., & Cumsille, P. (2003). Sibling differentiation: Sibling and parent relationship trajectories in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74, 1261-1274.
- Flanagan, C. A. (1990). Change in family work status-effects on parent-adolescent decision-making. *Child Development*, 61, 163-177.
- Fuligni, A. J., & Eccles, J. S. (1993). Perceive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early adolescents orientation toward pee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 622-632.
- Gutman, L. M., & Eccles, J. S. (2007). Stage-environment fit during adolescence: Trajectories of family relations and adolescent outcom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 522-537.
- Haase, C. M., Tomasik, M. J., & Silbereisen, R. K. (2008). Premature behavioral autonomy correlates in late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European Psychologist*, 13, 255-266.
- Hasebe, Y., Nucci, L., & Nucci, M. S. (2004). Parental control of the personal domain and adolescent symptoms of psychopathology: A cross-national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hild Development*, 75, 815-828.
- Lamborn, S. D., Dornbusch, S. M., & Steinberg, L. (1996).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context as moderator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family decision making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67, 283.
- Lareau, A. (2002). Invisible inequality: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aring in black families and white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747-776.
- Majorano, M., Musetti, A., Brondino, M., & Corsano, P. (2015). Loneliness, emotional autonomy and motivation for solitary behavior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 3436-3447.

- McElhane, K. B. , Allen, J. P. , Stephenson, J. C. , & Hare, A. L. (2009). Attachment and autonomy during adolescence. In R. M. Lerner, & L. Steinberg (Eds.),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pp. 358–403).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 Nucci, L. , Guerra, N. , & Lee, J. (1991). Adolescent judgments of the personal, prudential, and normative aspects of drug usag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 841–848.
- Pavlova, M. K. , Haase, C. M. , & Silbereisen, R. K. (2011). Early, on-time, and late behavioural autonomy in adolescence; Psychosocial correlates in young and middle adulthood.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4, 361–370.
- Peterson, G. W. , Bush, K. R. , & Supple, A. (1999). Predicting adolescent autonomy from parents; Relationship connectedness and restrictiveness. *Sociological Inquiry*, 69, 431–457.
- Qin, L. , Pomerantz, E. M. , & Wang, Q. (2009). Are gains in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beneficial for emotional functioning?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hild Development*, 80, 1705–1721.
- Smetana, J. G. , Campione-Barr, N. , & Daddis, C. (2004). Longitudinal development of family decision making; Defining healthy behavioral autonomy for middle-class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75, 1418–1434.
- Soenens, B. , & Vansteenkiste, M. (2010). A theoretical upgrade of the concept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Proposing new insights on the basis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Developmental Review*, 30, 74–99.
- Steinberg, L. (1987). Single parents, stepparents, and the susceptibility of adolescents to antisocial peer pressure. *Child Development*, 58, 269–275.
- Steinberg, L. (2002). *Adolescence* (6th ed.). Boston, MA: McGraw-Hill.
- van der Kaap-Deeder, J. , Vansteenkiste, M. , Soenens, B. , & Mabbe, E. (2017). Children's daily well-being; The role of mothers', teachers', and siblings' autonomy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contro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 237–251.
- Van Petegem, S. , Beyers, W. , Vansteenkiste, M. , & Soenens, B. (2012).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dolescent autonomy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Examining decisional independence from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8, 76–88.
- Van Petegem, S. , Vansteenkiste, M. , & Beyers, W. (2013). The jingle-jangle fallacy in adolescent autonomy in the family; In search of an underlying structur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2, 994–1014.
- Whiteman, S. D. , McHale, S. M. , & Crouter, A. C. (2003). What parents learn from experience; The first child as a first draf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5, 608–621.
- Wray-Lake, L. , Crouter, A. C. , & McHale, S. M. (2010). Developmental patterns in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across middle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European American parents' perspectives. *Child Development*, 81, 636–651.

(责任编辑 侯珂 责任校对 侯珂 刘伟)

Behavioral Autonomy in Adolescence: A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irection

LIU Yan¹, JIANG Suo^{2,1}

(1.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in School of Environment of Public Health,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Behavioral autonomy, or the ability to make independent decisions,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individual autonomy. Because it has long been acknowledged that becoming more autonomous is a central developmental task for adolescents, most research and theorizing on behavioral autonomy has focused on adolescence. In the current paper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extant literature concerning behavioral autonomy of adolescents is presented. It opens with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the term and an introduction of the measurement techniques. It focuses on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providing insight into the trajector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dolescents' behavioral autonomy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dolescents' behavioral autonomy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tant literature are discusse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develop more validated measures based on a clearer defi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behavioral autonomy. Moreover, understanding of adolescent development would be enhanced if, in future research, behavioral autonomy is explored in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adolescents' development.

Keywords: behavioral autonomy; adolescence;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